

【文学研究】

去其偏颇 得其神明

——鲁迅与《圣经》简论

王立明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沈阳 110034)

摘要: 鲁迅一生坚持科学, 反对各教派宣扬的宗教神话, 但却将了解宗教视为必要的修养。因此, 从他丰富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对世界三大著名宗教——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十分熟稔, 多有论述, 对那些较小的宗教流派也有一定的研究和阐释。本文侧重论述了鲁迅与基督教经典《圣经》的密切关系、对《圣经》的评价、对《圣经》故事的改编, 以及对《圣经》词语典故的灵活运用。

关键词: 鲁迅; 基督教; 《圣经》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 (2009) 02—0064—04

基督教发展至今已近 2 000 年, 是历史最悠久、信众最多的教派之一。基督教教义主要体现在由新、旧约合成的《圣经》之中。《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西方文化的象征, 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经典, 它对欧美、乃至世界文学艺术和文化的深远影响, 超过世界上任何一部文学作品。

在鲁迅的著述中不难发现, 他与《圣经》这部经典的密切关系, 其中既有对《圣经》艺术的中肯评价, 也有对《圣经》故事的改编, 以及对《圣经》词语典故的灵活运用, 充分体现了鲁迅对《圣经》文化的造诣之深, 也为我们今天正确借鉴外来文化有着积极引导作用。

一、对《圣经》的评价

鲁迅对《圣经》的评价, 最早见于他在 1907 年所写的一系列论文中, 如《人之历史》《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 鲁迅在青年时期就对基督教和《圣经》颇为了解。鲁迅在肯定《圣经》的文学价值和基督教在西欧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 对于其中所谓神创造世界的神学观点则给予了否定。在《人之历史》中, 他在介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及其

发展历史时说: “动植诸物, 与人类同, 无不能诠释以自然之律; 惟种亦然, 决非如《圣书》所言, 出天帝之创造”^{[1]12}。从根本上否定了《创世记》中上帝创造世界万物的宗教神话。在《文化偏至论》中, 鲁迅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基督教的历史及其与欧洲文化发展的关系, 特别是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原因、内容及巨大影响, 作了明晰而又详细的阐述。他说: “时则有路德 (M. Luther) 者起于德, 谓宗教根元, 在乎信仰, 制度戒法, 悉其荣华, 力击旧教而仆之。自所创建, 在废弃阶级, 黜法皇僧正诸号, 而代以牧师, 职宣神命, 置身社会, 弗殊常人; 仪式祷祈, 亦简其法。至精神所注, 则在牧师地位, 无所胜于平人也。转轮既始, 烈栗遍于欧洲, 受其改革者, 盖非独宗教而已, 且波及于其他人事, 如邦国离合, 争战原因, 后兹答辩, 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 思索自由, 社会蔑不有新色, 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 与形气学上之发明”^{[1]47}。充分肯定了路德宗教改革的意义和影响。

《摩罗诗力说》这篇论文可称得上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发轫之作。鲁迅在这篇论文中, 主要对 19 世纪初期欧洲各国的浪漫主义诗人, 即那

收稿日期: 2008-09-27

作者简介: 王立明 (1952—), 男, 山东荣成人, 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些所谓“摩罗派”诗人——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进行了比较研究。赞扬这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1]66}的诗人们的反抗精神，目的在于充分发挥文学的作用，为中国的反封建斗争引进“先觉之声”，以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

鲁迅在该文中阐述印度、希伯来、埃及等古代文学成就时说：“……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特在以色列族，则止耶利米（Jeremiah）之声；列王荒矣，帝怒以赫，耶路撒冷遂隳，而种人之舌亦默。当彼流离异地，虽不遽忘其宗邦，方言正信，拳拳未释，然《哀歌》而下，无废响矣。”^{[1]64}鲁迅在此充分肯定了希伯来文学“幽邃庄严”的特点及对宗教和文学艺术的深远影响，对《哀歌》的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此处所说的《哀歌》，即指《旧约》中的《耶利米哀歌》。公元前586年巴比伦人攻占耶路撒冷，并把大批的犹太人押送到本国去供使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之囚”事件。背井离乡的犹太人怀着国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和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创作了许多思乡哀歌，其中先知耶利米所作的《耶利米哀歌》最具代表性。他所写的哀歌感情深沉、哀怨动人，对于激励人们战胜仇敌，坚定重返故土的信念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哀歌也成为希伯来诗歌发展到高峰的重要标志。

在这篇论文的结尾，鲁迅写道：“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至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家国荒矣，而赋最末哀歌，以诉天下貽后人之耶利米，且未之有也。”^{[1]100}慨叹当时中国缺少“精神界之战士”，甚至连对失去家国的弱小唱一首哀歌的耶利米都没有，这该是多么大的悲哀与不幸啊！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对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及其创作论述较多，其中最推崇拜伦根据《圣经》故事改编的剧本《该隐》等作品，他说：“裴伦（又译拜伦）在异域所为文，有《哈洛尔特游草》（又译《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之续，《堂祥》（又译《唐璜》）之诗，及三传奇（按指《曼弗列特》《凯因》《天地》）（又译《曼弗雷德》《该隐》《天与地》）称最伟，无不张撒但而抗天

帝，言人所不能言”^{[1]77}。

鲁迅所说的《凯因》，即今译《该隐》，是拜伦在1821年根据《圣经·旧约》中的故事改编的一部剧本。在《旧约》中，该隐是亚当夏娃的长子，其弟亚伯。该隐种地，亚伯牧羊。秋收时，该隐以粮食为供物，亚伯以羊羔和羊脂为供物，献给上帝。上帝看中了亚伯的供物，而不喜欢该隐的供物，引起该隐的不满，在田野中将其弟杀死。该隐杀弟后被上帝在额头上烙下记号，四处流浪。该隐因此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凶手，也成为心胸狭窄、残酷凶狠的典型和罪恶的化身，历来被人们所不齿。

拜伦在其改编的剧本中则一反《旧约》中该隐的罪人形象，赋予这个形象以全新的意义。拜伦笔下的该隐不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嫉妒小人，而是一个善于思考、不甘心做奴隶的叛逆者。在剧本中，该隐不赞成亚当、夏娃、亚伯等人对上帝一味地赞颂和顺从，并且认为亚当和夏娃不应因吃了禁果而愧疚，而是应把生命树上的果子也吃掉。他疑惑上帝为何只喜欢羊羔羊脂这些带有血腥的供物，而不喜欢自己的素祭；为何亚当夏娃吃了“禁果”，就是大逆不道，就要被逐出伊甸园，终身受苦。于是，他大声质问：“上帝曾与人为友吗？”他开始拒绝祈祷，不再向上帝献祭，甚至想毁掉祭坛，结果失手打死了阻拦他的亚伯。最后他自我放逐到荒凉的地方。鲁迅之所以推崇拜伦《该隐》这部剧本，就是因为拜伦笔下的该隐是一个喜欢思考且具有鲜明反抗性格的人物。而在当时的中国，面对沉重的封建压迫、帝国列强的野蛮侵略，所缺少的恰恰是像该隐这样善于思考又具有反抗性格的战士。

二、对《圣经》故事的改写

1927年，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散文诗集《野草》，这部散文集不仅反映了鲁迅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矛盾、苦闷和追求，也表现了作者对黑暗势力的强烈憎恨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鲁迅在《野草》中写了两篇名曰《复仇》的散文诗。在第一篇中，他描写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之中，引起无聊人争相观看，以慰其无聊的情景；然而二人并无行动，使无聊者的观看目的最终落空。鲁迅创作这篇散文诗的意图就是“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

者之多”才作的。他没有让那些麻木的看客的无聊要求得到满足,这也正是对他们的复仇。

《复仇(二)》是鲁迅根据《马太福音》中耶稣受难的故事改写的。福音书中记载,耶稣作为上帝之子来世间传教,以拯救人类,不幸被其弟子加略人犹大为了三十块钱所出卖,致使耶稣被处以钉上十字架的极刑。耶稣在受难前,受到押解的兵丁和路人的戏弄、毒打、侮辱,直到死去。

应该说,鲁迅《复仇(二)》的情节与上述内容并无多大区别,他也写了耶稣受难前受到的种种戏弄和侮辱,以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肉体 and 心灵上所遭受的极大痛苦等情景。但有所不同的是,鲁迅笔下的耶稣,已不是那个被神化了的“神之子”,而是一个要以自己的奋斗和生命为人民谋解放的“人之子”,是一位社会改革者、一个舍己为人的英雄形象。然而不幸的是,这位“社会改革者”却被那些不觉悟的群众所侮辱。他不仅经受了肉体上的残酷折磨和极大的痛苦:“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骨髓中”,“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骨髓了”。更让他深感痛苦和悲哀的是巨大的心痛!他感到:“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他腹部波动了,悲悯和咒诅的痛楚的波。遍地都黑暗了。‘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上帝离弃了他,他终于还是一个‘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连‘人之子’都钉杀了。钉杀了‘人之子’的人们的身上,比钉杀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污,血腥”^{[2]174-175}。

鲁迅改写《圣经》中这段内容,是有其特殊用意的。耶稣带着拯救以色列人的心愿来到世间,然而却不被他们所理解,反而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对这些麻木不仁的同胞是悲悯和咒诅的,悲悯他们的愚昧和落后,咒诅他们的邪恶和残忍;同时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鲁迅看来,耶稣的不幸遭遇与当时中国的一些社会改革者境遇非常相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最黑暗腐朽时期,一些社会改革的先驱者奋起斗争,结果遭到的不仅是反动派的镇压,也遭到了不觉悟的民众的嘲讽讥消,例如鲁迅在小说《药》中所描写的年轻革命者夏瑜的经历。革命者夏瑜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被封建统治者所杀害,她的死不仅没有唤起同胞的觉醒,反而遭到那些麻木不仁的同胞的嘲讽。更有甚者,华老栓竟然用蘸

了夏瑜鲜血的馒头来为儿子治病。夏瑜的不幸与耶稣的受难是何其相似!鲁迅正是借耶稣的受难来喻指中国社会改革者的不幸。

三、对《圣经》词语典故的灵活运用

鲁迅以科学的拿来主义态度对待一切外来文化,在其丰富的著述中,读者随时都能发现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借鉴、扬弃与批判。对于《圣经》,鲁迅亦是如此。他常常在其作品中信手拈来地引用《圣经》中的词语典故,并以此为喻,对中国现状加以分析。例如,1933年,鲁迅在《〈一个人的受难〉序》中说:“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进针孔还要难。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Passion)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3]152}。《一个人的受难》是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尔一组木刻的名称。木刻描写了一个普通工人的不幸遭遇和斗争精神。鲁迅非常欣赏这组木刻的“写实”风格,他亲自为每幅木刻作了文字说明。

鲁迅不仅在其作品中改写过耶稣受难的故事,他在其他论述中也曾提到此事,或者以此事作喻,论及中国的现实问题。1931年,鲁迅在为美国《新群众》杂志所作的《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中,就以耶稣受难来比喻中国左翼文艺和无产者的处境,他说:“左翼作家们正和一样被压迫被杀戮的无产者负着同一的命运,唯有左翼文艺现在和无产者一同受难(Passion),将来当然也将和无产者一同起来”^{[4]288}。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在文坛上曾引起过很大的震动。当年,“现代评论派”不但把鲁迅揭露和讽刺他们的杂文作为广告以抬高自己,而且还把自己的无能,都归咎于“鲁迅说了坏话的缘故”。对“现代评论派”的无耻行为,鲁迅进行了严厉批驳,他说:“我又不学耶稣,何苦替别人来背十字架呢?”^{[5]482}“背十字架”一说源于《圣经·新约》。据《新约》记载:耶稣在受难前曾向门徒预言,他上耶路撒冷去将被人杀害。他的门徒彼得劝他不要去,他却回答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又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6]19}“背十字架”由此成为承受痛苦和磨难、富有牺牲精神的象征。鲁迅正是借此“象征”来声明,他是不会为“现代评论派”承担那些与己毫无关系的责任的。

在《圣经》中，上帝是一位创造世界、主宰一切的神。后来也常常被人们喻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象征。鲁迅有时也在文章中灵活地运用“上帝”这一象征来论人议事。1925年，鲁迅自称是交了“华盖运”的一年，为了回击那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们的谰言，鲁迅不得不放弃其他的创作，而写一些“短评”，《华盖集》就是这样集成的。在《华盖集》中，鲁迅曾多次提到“上帝”这一象征。例如，他在《我观北大》一文中说：“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5]156}。在《并非闲话（二）》中说：“不是上帝，那里能够超然世外，真下公平的批评”^{[5]126}。20世纪20年代，有关“大内档案”的事曾被炒得沸沸扬扬，鲁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在这篇杂文中，鲁迅深刻揭露了那些打着学者、考古家的旗号，却干着盗窃勾当的蛀虫们。他说：“但我对于有关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将罗马字来替代。既非欧化，也不是‘隐恶扬善’，只不过‘远害全身’。……所以要稳当，最好是不说。但我现在来‘折中’，既非不说，而不尽说，而代以罗马字，——如果这样还不妥，那么，也只好听天由命了。上帝安我灵魂！”^{[5]544-545}又说：“凡是我们捡起在桌上

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5]547}辛辣地嘲讽了那些政府官员的贪婪和无耻。

四、鲁迅对《圣经》的借鉴意义

鲁迅对《圣经》和基督教的态度，与对待其他外来文化一样，都抱着科学的拿来主义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这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中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7]39}。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写道：“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7]40}。第二，灵活运用，继承与批判、融合与创新兼而有之。无论是外来文化还是传统文化，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由于产生的时代和民族的不同，必然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对待这些文化遗产的态度，既不能不加区分、一概照单接收，亦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而应向鲁迅学习，把那些好的、有益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对于那些文化垃圾，则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之。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3] 鲁迅. 鲁迅全集：第5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4] 鲁迅. 鲁迅全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5] 鲁迅. 鲁迅全集：第3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6] 圣经·新约 [M]. [出版地不详]：中国基督教协会，1989.
- [7] 鲁迅. 鲁迅全集：第6卷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王 芳)

Lu Xun and the Bible

WANG Li - m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 China)

Abstract: Although Lu Xun persisted in science in his lifetime and opposed religious myth spread by sectarians, he regarded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s as a necessary accomplishment. From his works we can see that, he was very familiar with the three major religions—Buddh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and he made many discussions on them. He also studied and explained about some smaller religious schools. Through the evaluation on *the Bible*, the adaption of *the Bible* stories and the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the words and quotations in *the Bible*,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 Xun and *the Bible* is discussed.

Key words: Lu Xun; Buddhism; *the Bible*